



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 挤出效应研究

Research about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FDI on the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

王永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 挤出效应研究

Research about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FDI on the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

王永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FDI 对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出效应研究 / 王永齐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 - 7 - 5161 - 7519 - 4

I. ①F… II. ①王… III. ①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832.6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807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刘海英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外资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的可能	2
第三节 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渠道	3
第四节 金融市场在挤出效应中的作用	6
第二章 FDI 引致经济增长的路径	8
第一节 FDI 与资本形成	8
第二节 FDI 与技术溢出	11
第三节 FDI 与人力资本积累	15
第四节 FDI 与生产率	18
第五节 FDI 与示范模仿	22
第六节 FDI 与市场结构	25
第七节 FDI 与工资水平	30
第八节 FDI 与贸易	34
第三章 FDI 对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出效应争论	38
第一节 FDI 溢出的约束条件	38
第二节 FDI 挤出效应存在的可能	44
第四章 FDI 对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出渠道	49
第一节 竞争性挤出效应	49
第二节 并购与纵向一体化	51
第三节 融资竞争	54
第四节 贸易条件效应	56
第五节 外资与劳动力流动	58

第五章 金融市场与 FDI 挤出效应	62
第一节 金融市场与外商直接投资绩效	62
第二节 劳动力流动模型	64
第三节 纵向溢出模型	67
第四节 融资约束模型	72
第五节 创新模型	77
第六节 总结性评论	79
第六章 FDI 在中国的动态演变	82
第一节 FDI 模式演变	82
第二节 外商投资规模演变	87
第三节 FDI 行业分布	90
第四节 FDI 空间分布	93
第五节 总结性评论	96
第七章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	98
第一节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水平	98
第二节 资本市场发展	104
第三节 金融市场结构演变	109
第四节 区域金融市场发展	111
第八章 FDI 挤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120
第一节 挤出效应的总体检验	120
第二节 外资对不同类型国内企业的挤出效应	123
第三节 不同类型外资企业的挤出效应比较	129
第九章 不同产业的挤出效应比较	134
第一节 产业选择与划分标准	134
第二节 不同产业挤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140
第三节 外资的相对挤出效应及其投资倾向	146
参考文献	151
后记	193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外资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其关键任务就是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发展之实际意义，诸多结果印证了 FDI 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 FDI 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因素，在吸引 FDI 的相关政策上也变得更加灵活和自由，总体来看，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变得更加自由化，规模呈快速上升趋势。^① 大多数国家通过实施种种灵活性政策（诸如税收优惠和补贴）以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与此同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上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所吸引的外资规模不断上升，在 1980—2007 年这 28 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 121%，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年增长率则达到 237%，到 2007 年，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4.24 万亿美元，占全部外资存量的 28.9%。而大量的研究结果也证实，FDI 对一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Blomstrom 等（1992）和 Borensztein 等（1998）的研究发现 FDI 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而基于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同样得到了相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Engines of Growth,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1992; 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Division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vestment, United Nations, 1995.

同的结论，Mortimore 2000 年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发现，FDI 和国内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Kohpaiboon 2003 年对泰国的研究显示，FDI 与 GDP 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采用相似的分析方法，Marwah 和 Tavakoli 2004 年分别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 对四个国家的 GDP 的增长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既然 FDI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FDI 究竟通过什么特定的渠道引致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相关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实现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和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因此，引致经济增长的原因常常被归结为投资的增加（资本形成）以及投资的效率。

既然如此，如果遵循新古典的资本—增长理论分析框架，那么，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促进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对这一问题否定的回答意味着外资进入将对东道国相应行业内的原有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这时内外资之间将是替代关系。而对于开放条件下的国家而言，如何考虑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及其对国内现有企业通过不同渠道产生的挤出效应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节 外资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的可能

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沿着钱纳里等（1966）的思路采用新古典两缺口分析框架，在索洛模型基础上，将资本和劳动两要素假设扩展为资本、劳动、技术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变量矩阵等多要素模型，在技术进步外生的情况下，认为 FDI 无非是弥补本国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增加一国的资本存量，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和本国的投资率，而投资率的上升所产生的水平效应必然会提高人均产出水平，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但这种分析方法往往认为 FDI 与国内资本是同质无差异的，并没有考虑到外资与内资的相互关系问题，逻辑暗含假定了外资的进入并不会减少东道国国内资本的形成，外资和内资是一种互补而非替代关系，因此并不会发生挤出效应。

另一种是以 Johnson1975 年的研究为出发点的新增长理论，这种理论

认为，FDI 是资本、专利和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单纯的资本积累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可能是短期的，FDI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主要体现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主要途径在于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强化内外资的前后向联系，进而克服资本积累的报酬递减特征，提高本国资本的边际产出和生产率并加速本国资本形成，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深远。

这种分析逻辑肯定了 FDI 对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积极影响，但忽视了技术和知识的可获得性以及东道国对技术溢出的接受能力，如果内外资企业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差距或者东道国获得相应技术的渠道受到限制和阻碍、现有人力资本水平也无法对技术和知识溢出加以接收，那么 FDI 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效应可能并不明显，意味着 FDI 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影响在一系列因素的约束下即便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诸多研究也证实，只有当一国具备一定的发展水平（如人力资本存量状况）时，外商直接投资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进言之，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取决于 FDI 和国内投资的关系，只有在两者是互补的情况下，FDI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是最优的，而当一国缺乏必要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存量时，溢出效应较少或不存在溢出效应的情况下，FDI 对本国资本形成存在某种程度的挤出效应。另外，外资带来的新技术可能会加速本国传统技术的落后，因此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降低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Kokko 1994 年的研究则认为，外资企业往往具有规模优势，从而获得规模经济，这将有可能对国内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第三节 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渠道

（一）竞争性挤出效应

外资流入一方面为东道国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本，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市场结构，竞争程度的提升将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产生激励，但竞争不可避免地对国内企业的投资和资本形成产生压力，甚至产生挤出效应，尤其是在外资与国内资本质量不同的情况下，这种资本方面的差异或者是技术方面的差距会对国内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当地企业并不具备足够的效

率与外资企业进行竞争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时，当地企业可能被挤出市场，在外资集中度比较高的行业，由于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发生溢出的可能性几乎不太现实。Kokko 1996 年对墨西哥和 1998 年对乌拉圭的研究表明，只有当外资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较小时，溢出才有可能发生；反之，随着外资企业市场份额上升，当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时，挤出效应将会发生。

（二）并购与纵向一体化

兼并与收购是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重要方式，横向并购将导致国内企业数量下降，市场集中程度提高，这种市场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导致国内企业的租金转向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增加国内企业进入这一市场的成本。纵向并购则会造成外资在产业链上的全面整合，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决定了企业需要不断调整其与上下游企业间的关系，并利用其在产业网络中的联系来降低其信息搜寻的成本，增强获取新的技术机会和信息的能力。

根据 Dunning OLI 范式，对于跨国公司的三种优势而言，垄断优势是决定其 FDI 最根本的因素，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维持既有优势和创造新的垄断优势，其直接效应就是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对诸多产业的产业控制，使东道国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由于外资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具有技术机会优势，市场结构的深化将导致国内产业面临着不同的市场结果。跨国并购不但增强了跨国公司国际融资和资本的扩张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企业买卖或“一揽子要素”的产权交易，提高了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重组企业资产的能力及其效率。交易整合优势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优势，跨国公司可以根据内外因素相对重要的变化对其进行整合，从而使得跨国公司的既有优势成为一种动态可变的整体性优势。^① 拥有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跨越歧视市场壁垒，保持稳定的加工市场集中度和寡头竞争稳定性，排斥中小规模厂商，一旦它控制市场就可能压制竞争，降低市场效率，破坏市场结构。

（三）融资竞争

金融市场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企业面

^① 张小蒂、王焕祥：《论跨国公司 FDI 中基于并购的要素交易整合优势》，《世界经济》2004 年第 7 期。

临的融资约束必然会增加其参与竞争的成本。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表现为东道国的资本净流入，很多投资是在东道国当地融资，如果外资企业向东道国银行大量借贷作为针对汇率波动的套期保值工具或是对人为降低的国内利率的反应，那么，很可能将国内民营企业挤出资本市场，从而加剧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另外，外资企业也可能通过产品市场对国内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即由于外资企业明显的竞争优势而抢占民营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从而降低民营企业的盈利，进一步恶化其融资困境。Harrison 和 Macmillan (2003) 运用 1974—1987 年来自非洲科特迪瓦的企业层面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国内私营企业相比外资企业更受融资约束；外资企业长期在东道国银行部门的借贷将提高利率水平，从而加剧了国内企业的信贷约束，对国内私营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四) 贸易条件效应

外资流入对一国贸易条件将产生影响，影响的渠道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出效应，外资流入势必导致一国总产出增加，价格下降。二是行业分布效应，如果外资流向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导致出口增加，出口竞争的加剧将使得出口价格下降；反之，外资流向进口部门，将产生进口替代效应，这时进口品价格将下降，从而改善一国贸易条件。三是转移定价效应，外资企业通过转移定价也会导致贸易条件下降。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效应，外资流入可能会导致一国贸易条件的下降，贸易收益减少，从而会对国内出口部门企业的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五) 外资与劳动力流动

外资流入在要素市场上将从两个方面对国内企业产生影响：一是工资成本变动。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要高于国内企业，外资进入将导致一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造成生产成本增加，这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内的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劳动力流动。由于外资企业支付相对更高的工资，将导致国内企业的劳动力尤其是高生产率的劳动力流向外资企业，进而造成国内企业生产率的下降和产出的减少。工资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力流向外资企业这两大效应将对国内企业生产产生挤出效应。

另外，从要素流动角度来看，外资企业通过支付更高的工资吸引本地更优秀的专业人才，并通过继续支付高薪来减少人才流失和降低劳动流动成本；并且外资企业具备的高收入效应将导致高质量生产要素向外资企业流动，从而导致国内生产率的下降。Gorg 和 Greeway 2004 年的研究认为，

如果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竞争，那么内资企业就会被迫支付高工资来防止员工外流到外资企业中。因此，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工资竞争将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上升。Gallagher 和 Zarsky 2007 年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如果外国投资者从国内企业雇用企业家和技术工人，将导致逆向知识溢出。

第四节 金融市场在挤出效应中的作用

完善的金融市场对于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同样会约束 FDI 溢出效果。Alfaro 等（2004）的研究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金融市场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家形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促使劳动力从外资企业流出以建立自己的企业，通过引致企业家形成这样的机制促进国内资本形成，金融市场将约束企业家形成和投资水平。Alfaro 等（2003）的研究认为，内资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或参与外资企业分工格局中势必要购买机器设备、雇用技术工人，这都需要金融市场为其提供融资，金融市场越完善，内资企业的投资率和技术水平都将得以提高，溢出效果越明显。Alfaro（2004）进一步证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越大，内资越具有向金融市场融资的动力。Alfaro 等（2006）则从理论上阐述了金融市场在促进 FDI 纵向溢出方面的作用。Azman – Saini 等（2010）的研究同样证实了只有当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才是正向的。Hermes 和 Lensink 2003 年的研究则认为 FDI 和金融市场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是互补的，金融市场效率提高将有利于 FDI 流入，同时也将提高本国技术水平。Borensztein 等 1998 年的研究认为 FDI 流量只不过是 FDI 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外资是通过债务关系存在于东道国，因此国内金融市场的质量同样会影响到 FDI 的数量及 FDI 溢出效果。单纯只考虑 FDI 流量可能会低估 FDI 的影响。而 Rowland 和 Tesar 2004 年的研究则强调完善的金融市场将鼓励 FDI 企业进行高风险投资。

因此，FDI、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相关关系，当一个国家存在着良好的金融市场时，不仅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而且能获得更多的 FDI 收益。即金融市场将使得一国获得相应比较优势，这对于提高其

吸收能力具有积极作用。Baiuiu (2000) 的研究则认为金融市场不完善以及金融市场扭曲将导致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些研究都表明：FDI 有关的吸收能力与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呈正向关系，金融体系越发达，FDI 的技术、效率、管理等扩散效应就越大，FDI 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越明显。

第二章 FDI 引致经济增长的路径

第一节 FDI 与资本形成

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遵循钱纳里和施特劳斯在 1966 年提出的两缺口模型，将投资、储蓄和进出口同引进外资联系起来，成为各国分析国内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工具。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处理好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关系。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会出现“储蓄缺口”；如果进口小于出口，就会出现“外汇缺口”。其解决办法是引进外资，以刺激出口，提高储蓄水平，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而外资通过三个阶段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一阶段，弥补吸收能力的不足；第二阶段，弥补储蓄缺口；第三阶段，弥补外汇缺口。该模型强调了利用外资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之后的研究也都沿用了两缺口模型，将 FDI 与储蓄和投资联系起来分析开放条件下资本流动对资本形成的影响。

Barro (1991)、Delong 和 Summers (1991, 1993)，以及 Levine 和 Renelt (1992) 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资本形成率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要将 FDI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放在开放条件下分析，不可绕开的问题就是 FDI 能否促进一国的资本形成率。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初始资本存量水平往往较低，如果有额外的资本存量流入将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和增长率，即在资本短缺的国家，诸如 FDI 这样长期投资所带来的额外资本流入将提高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并在长期提高其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在内生增长理论看来，这种 FDI 所带来的投资效率的提高将使资本稀缺国家获得比较优势并最终在长期增长过程中与发达国家出

现趋同的结果,^① 并且, FDI 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投资所需要的资本为资本形成提供多种支持。因此, 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 FDI 通过增加资本稀缺国家的物质资本的存量和效率来促进其经济增长。^② 换言之, FDI 所带来新技术、专利以及市场容量扩张将通过创造就业、增加管理技术、技术扩散和激励创新等途径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长期资本。^③

学者对拉美的研究发现, FDI 与资本积累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Borenstein 等 1998 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 FDI 对国内投资起到促进作用, 意味着 FDI 的流入将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挤出效应。De Mello 1999 年以全部 OECD 国家和非 OECD 国家的样本分析了 FDI 对东道国资本积累、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 FDI 对经济增长产生双重效应, 一是纳入新技术和新的投入品生产函数通过促进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二是多种形式的知识转移提高了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Bos Worth 和 Collins 1999 年以 58 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分析了资本流入与国内投资的关系, 并具体区分了资本流入的三种形式: FDI、间接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资本, 研究证实, 一美元的资本流入将对国内投资起到 50% 的拉动作用。而 FDI 的流入对国内投资的拉动作用则接近 100%, 一美元的 FDI 将拉动等量的国内投资, 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入对国内投资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

Lensink 和 Morrissey 2001 年则从 FDI 和 FDI 波动两个角度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 FDI 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FDI 本身则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Kumar 和 Pradhan 2002 年以 107 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分析了 FDI、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 FDI 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影响着国内投资, 无论是所有国家的面板检验还是单个国家的数据检验都得到相同的结论: FDI 对国内投资的初始短期效应为负, 而长期影响为正。Razin 2003 年则以 64 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用 4 个组合方程检验了 FDI、国内投资、国际借贷和国际组合投资之间的关系,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更为显

^① Paul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 5, 1986, pp. 1002 – 1037.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罗默 (1986)、卢卡斯 (1988)、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1991)、巴罗和萨莱马丁 (1995)。

^③ Elizabeth Asiedu, "On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Africa Differ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30, No. 1, 2002, pp. 107 – 119.

著，并且国内投资在 FDI 流入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①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FDI 与国内资本形成之间的分析无论假设条件、分析方法是否存在差异，都具有相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遵循储蓄—投资恒等式 $I = S + (T - G) + (M - X)$ 。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低储蓄率和贸易逆差是一种常态，而低储蓄率往往导致国内投资不足，外商直接投资则为东道国的储蓄和投资提供一种主要的资源，因此，对于储蓄—投资缺口约束下的经济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将提高一国的投资增长率。并且，相对于其他外资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受到的束缚相对较少，流动范围更为广泛，对经济的影响也相对更为深远。

第二，外商投资提供了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增加国内储蓄并提高投资水平，并且，如果外资流向进口替代部门，将减少进口部门的外汇需求，并将外汇用于出口部门，这将会提高一国增加外汇收入的能力。而外资的流入不仅仅是扩展了当地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创造新的产业，进而增加了对当地投入品的需求，中间品部门随之扩张，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政府税收的增加将增加本地收入水平，而人力资本和技术也将由外资企业不断流向当地企业。

第三，对于特定的转型国家而言，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只能通过不同形式的投资努力，通过经济体内的投资—加速原理，将技术—生产—经济融为一体，事实同样证明，投资是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的主要来源，投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固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现有固定资本的技术的生产能力的扩张，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就业机会。

第四，FDI 往往被假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即外资的流入将导致国内投资发生，这时一国资本存量的增加一方面表现为外资增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 FDI 流入所诱发的国内投资的增加，而这些国内投资的增加在没有 FDI 时将不可能发生。根据内生增长模型，FDI 通过引入新产品和技术的形式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促进作用，因此，FDI 对国内资本形成的促进作用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新产品和技术的发展。

第五，FDI 通常会流向资本短缺国家的高生产率部门，这将通过提高

^① 此外，Misun 和 Tomsik 2002 年对匈牙利和捷克的研究、Drifffield 和 Hughes 2003 年对英国的研究、Arndt 等 2007 年对德国的研究都证实 FDI 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促进作用。

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分析逻辑遵循着资本投资—经济增长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基本规则，并且将 FDI 看作是一种稳定且可靠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来源。^①

第二节 FDI 与技术溢出

与 FDI 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强调资本在量的积累不同的是，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增长不仅仅取决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数量，同样依赖于投资的效率，因此，FDI 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FDI 所带来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人力资本、创新、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将这些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内所得到 FDI 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相关关系是实现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从内生增长理论来看，FDI 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潜在角色是作为技术扩散的主体，这一观点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 Solow 1956 年的重要研究，因此，有必要将 FDI 纳入生产函数中借用于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对其影响进行分析。^②

将 FDI 纳入生产函数来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发端于钱纳里和塞尔昆 1975 年的研究，受此影响，Kindleberger（1979）、Romer（1986）、Lucas（1988）、Mankiw 等（1992）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 FDI 所带来的内生增长过程。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技术在多大程度上由 FDI 传递给接受国，二是这样的技术溢出对东道国的影响程度空间有多大。^③

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内，长期经济增长被视为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

^① 这一观点可参见 Blomstrom 等（1994）、Borensztein 等（1995）、Balasubramanyam 等（1996）、Lipsey（2000）、Moosa（2002）、Moosa 和 Cardak（2006）的研究。

^② Easterly 和 Levine（2001）、Caselli（2004）的实证研究同样显示，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而非要素积累。

^③ 关于技术溢出这一现象，经济学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对此给予大量的研究，Ethier（1982）、Rivera-Batiz 和 Romer（1991）、Feenstra（1996）、Grossman 和 Helpman（1990）从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溢出问题给予一定程度的解释。Coe 和 Helpman（1995）以及 Keller（1998）从实证角度证实了溢出的存在性问题。当然，这些研究只是从贸易角度来阐述溢出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 FDI 同样是技术溢出的一种渠道。

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函数,^① Findly 1978 年有影响的研究认为, 外资投资企业在技术进步中扮演着加速器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国内企业了解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的机会越多, 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增长就相应越快。不断增加的实证研究文献同样支持这一 FDI 引致经济增长的假设。^② 源自 Romer (1990)、Grossman 和 Helpman (1991)、Aghion 和 Howitt (1992, 1997, 1998) 的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积累和应用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随着一个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 其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知识存量, 同样取决于其他国家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大量的增长理论研究试图探求国内知识存量和国际技术溢出对一个国家生产结构和生产率的影响, 基本的结论认为, 国内的研发支出将对产出和生产率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同样的, 国际知识转移会影响到一国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率。

而大多数研究溢出的模型采用的是产业内而非产业间数据, 因此, 实证检验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验证理论预期, 在这样的框架内, 溢出效果要么不存在, 要么不显著 (Aitken & Harrison, 1999)。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跨国公司为了避免由于竞争带来的租金耗散, 在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往往采取使专有技术知识最小化扩散风险的投资模式, 因此, 东道国通过补贴等措施力图获得制造业方面的技术溢出注定不可行。并且, 关于产业 R&D 溢出的研究显示, 重要的技术溢出往往发生在产业间而非产业内。Scherer 1982 年的研究发现, R&D 溢出发生在产业间而非产业内。Glaeser 等 1992 年发现溢出发生在产业间的概率要大于产业内发生的概率, 而大多数重要的溢出基本发生在产业间而非产业内。Howitt 等 2005 年关于混合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 企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存在, 当竞争效应占主导地位时, FDI 企业与当地企业的竞争所带来的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损失使得技术溢出效果无法对产出做出贡献。因此, 产业间而非

①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1)、Romer (1994)、Rair – Reichert 和 Weinhold (2001) 的研究基本都从技术进步或溢出角度研究了生产函数的变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② 如 Saint – Paul 1992 年以及 Obstfeld 1994 年的研究认为更高水平的国际交易量可以通过分散投资风险的形式来增加资本的生产率, 风险分散可以进一步促进国内投资于创新活动, 这反过来影响到长期经济增长。Walz 1997 年的研究认为外资企业对国内 R&D 部门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哈达德和哈里森 (1993)、阿特金和哈里森 (1999) 两篇有影响力的研究为以后关于溢出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 之后关于溢出的研究主要从产业关联所产生的纵向溢出效应加以展开。